



国的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

葛贤宁◎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013932004

K203
234



中国的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

葛贤宁◎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K203
234



北航

C163915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的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 / 葛贤宁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3.2
ISBN 978-7-5426-4083-3

I. ①中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中华文化 - 研究 IV. ①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0240 号

中国的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

著 者 / 葛贤宁

责任编辑 / 叶庆李珏

装帧设计 / 水玉银文化

监 制 / 任中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<http://www.sjpc1932.com>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 刷 /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2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/ 145 千字

印 张 / 10.5

ISBN 978-7-5426-4083-3
G · 1227 / 定价: 28.00 元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人类历史的演进与循环 | 1 |
| 西方学者史观的演变 / 1 | |
| 中国学者史观的演变 / 6 | |
| 一个正确的史观——演进与循环 / 13 | |
|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复兴 | 15 |
| 上古三代间民族发展周期及复兴期 / 15 | |
| 秦汉魏晋南北朝期间民族发展周期及复兴期 / 19 | |
| 隋唐至民国间民族发展周期及复兴期 / 23 | |
| 第三章 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（一）——西周与两汉 | 30 |
| 文艺复兴的意义 / 30 | |
| 西周的文艺复兴 / 32 | |
| 汉代的文艺复兴 / 36 | |
| 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（二）——唐代 | 43 |
| 唐代人文主义再起与文化的复兴 / 43 | |

2 中国的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

乐、舞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/ 47

诗歌的黄金时代 / 51

唐代散文小说与美术的复兴 / 58

第五章 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（三）——宋代..... 61

晚唐五代文艺的靡弱 / 61

宋代古文与诗的复兴 / 63

宋代词的极盛 / 66

宋代小说的发展 / 69

宋代美术的复兴 / 71

第六章 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（四）——明代..... 73

元人统治下黑暗世纪的文艺 / 73

明代南曲、古文与诗的复兴 / 78

明代小说的繁盛 / 83

明代美术 / 86

第七章 现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必然性..... 88

从民族内部的大融合来说 / 88

从民族武力的恢复与强大来说 / 89

从民族经济的繁荣来说 / 91

从仁道的政治来说 / 95

从民族伟大领袖的出现来说 / 97

第八章 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前提 99

中国文化特质及近世西方文化的反人文主义 / 99

十九世纪末叶中国学者的反人文学说 / 102

“五四”以来学者的反人文主义运动 / 106

人文主义的再兴：新人文主义 / 110

第九章 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条件 115

政府的提倡与奖励 / 115

作家的觉醒（一）——人文主义的发扬 / 117

作家的觉醒（二）——综合与创造 / 121

作家的觉醒（三）——以文艺复兴促成民族的复兴 / 126

第十章 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展（一）——文学的复兴 129

诗歌的复兴 / 129

小说的复兴 / 134

戏剧的复兴 / 139

第十一章 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展（二）——艺术的复兴 144

音乐的复兴 / 144

舞蹈的复兴 / 148

绘画的复兴 / 152

建筑与雕刻的复兴 / 156

第一章 人类历史的演进与循环

西方学者史观的演变

人类历史的演蜕，常有两种自然的现象：一是进化的现象，一是循环的现象。可说人类历史便在这两种现象交织中形成的，也即在进化中有循环，循环中有进化。然而世人具此正确的史观者极少，不是流于偏至的进化说，便是流于偏至的循环说，或是落于既非进化亦非循环的其他谬说。

公元前八至六世纪间，闪族（Semites）的加尔底亚人（Chaldea）重建巴比伦帝国时，他们的天文家发现了日月星辰的循环运用及季节的周而复始，因而领悟到宇宙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。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遂据之而创“历史循环说”，对人类历史的一面看得何等清切。及希腊文化衰颓，代“历史循环说”而兴的是“宇宙衰老说”（Cosmic Senescence）。彼时希腊许多学者均认为彼等所生存的社会，由于宇宙的衰老必将归于崩溃的。基督教大兴后，西方学者产生了救世论与末日论。人类的主宰既为上帝，人类历史亦在其创造与控制中，无所谓演进与循环，这是基督教思想弥漫中的西方学者的历史观。

近世以来，西方学者偏重于人类各种进步事物的研究，遂产生进化说的历史哲学。历史家依人类用具的进化，分历史为石器、铜器、铁器三个时代；依人类生活的进化，分历史为渔猎、畜牧、农业、工业四个时代；

依人类社会的进化，分历史为图腾社会、氏族社会、封建社会、商农业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等几个时代；依人类政治的进化，分历史为神权、君权、民主几个时代；依人类文化的发展，分历史为野蛮及文明两个时代；其中每一个大时代，又可分为几个时期，界限分明。总之，历史家们的全部心血都贯注在对历史进化的研究、分析与记载上。在他们看来，人类历史的演进是一种直线型的，好像一个人由幼儿园（原始时代）、而小学（上古时代）、而中学（中古）、而大学（近代及现代），永远在向上与向前，绝无所谓迂回曲折的。

与历史学有关的考古学家、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，亦莫不具有此种直线型进化的观念。生物学家们的研究成果，尤助长此种观念的开展，生物学家们研究生物的构造（Structure）、新陈代谢（Metabolism）、生长（Growth）、生殖（Reproduction）、感应（Irritability）等生命现象（Life Phenomena），莫不重视演化论（Evolution）的发扬。他们为生物编造家谱，靠着可能性和种种学说绘出生物的来龙去脉，证明它们的演进。例如，单细胞动物的鞭毛虫可演化出两类动物：一为海绵动物，再演为节肢动物；一为腔肠动物，再演为脊椎动物。他们又说明动物和植物的社会生活也在逐渐演化中。人类则为无尾猿类进化而来，猿类又为食虫类动物的演化，现时的树鼯（Tree shrews）（食虫类）即可能为猿类祖先的近亲。从生物学家们的研究报告中，一切生物（连人在内）都在演进中。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是一部生物学著作，也是一部哲学的著作，进化论于是侵入了哲学的领域，历史哲学自然免不掉它的影响。

十八、十九两世纪中西方“物理的科学”，如矿物学、地质学、物理学、化学等研究，亦有部分演化的情形，使进化论益为扩播，也间接影响了直线型进化史观。

由上所述，可知西方学者对历史进化的一面，又看得何种透彻！可是历史演蜕的另一面——循环的现象，却完全被忽视了。

近半世纪来，西方学者对这种直线型进化史观多持异议，而产生周期

说的史观。俄国人达尼列夫斯基 (N. I. Danilevsk) 在十九世纪末即有周期之说, 为此类学说的最早者。达氏在他所著《俄罗斯与欧洲》一书中, 曾述他对埃及、中国、古闪族、印度、伊朗、希伯来、希腊、罗马、阿拉伯、欧洲等十个“历史文化型”(Culture historical types) 研究的结果, 归纳出五个定律。其中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定律: 各型文化的发展阶段, 极像长生植物的生命过程。它们的生存和滋长是无限度的, 但是它们开花和结果的时期却极其短促; 而且经过一次开花结果后, 它们的力量就消耗净尽, 永远再没有第二次的花果。即是说每一个历史文化型, 都只有一次创造力的发展, 过此便趋于沉寂。达氏以植物的生命过程比拟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, 可说视人如物, 错误很深。

德人斯宾格勒于 1918 年出版了《西方的没落》(*Der untergang abendlards*) 一书而负盛誉。他认为一个文化 (Culture) 和一个人一样: 要经历过幼年、少年、壮年、老年四个连续的阶段而终不免于死亡。这四个阶段又相当于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连续的季节, 各有它们特殊的征候和色彩。最后的阶段, 为老年阶段、冬季阶段, 又称文明 (Civilization) 阶段, 即文化的末路。因为文明是文化最后所假造的外表, 由此即趋于死亡。操纵这种文化生死过程者, 也便是操纵我们一切人生的“宇宙能力”。斯氏并分析世界八十文化共有四季和十四阶段, 指出埃及、巴比伦、印度、中国、希腊、罗马、阿拉伯、墨西哥等七种文化都早已没落。第八种的西方文化, 自歌德、谢林 (Schelling)、康德、黑格尔、菲希德等人起, 即入冬季, 本世纪已正在没落中。斯氏以个人生命各阶段比拟各民族文化生命各阶段, 非常错误。个人生命属自然生命, 自是不能不受自然律的支配。可是民族文化的生命, 已超越了自然界而进入人文界, 就绝非自然律所能限制。个人生命有死亡, 民族文化生命却能长久延续, 不能说是有一固定限期和只有一次创造力的发展, 且必须死亡的。斯氏对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, 不仅肤浅, 根本上即未能了解。

英人汤因比 (Arnold J. Toynbee) 为当代史学大家, 其所著《历史研究》

中指出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社会，共有二十一个，如下表：

- (1) 米诺斯社会 → 希腊社会
 - ↗ 西方社会
 - ↘ 希腊正教社会
 - ↖ 拜占庭正教社会
 - ↙ 俄罗斯正教社会
- (2) 叙利亚社会
 - ↖ 伊朗社会
 - ↙ 阿拉伯社会
 } 伊斯兰教社会
- (3) 苏美尔克社会 → 印度社会 → 印度教社会
 - ↗ 巴比伦社会
 - ↘ 赫提社会
- (4) 远东社会
 - ↖ 中国社会
 - ↙ 日韩社会
- (5) 埃及社会（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）
- (6) 新大陆社会
 - ↖ 墨西哥社会
 - ↙ 玛雅（Mayan）社会
 - ↘ 安第斯（Andean）社会
 - ↗ 育加丹（Yucatic）社会

汤氏指出其中除西方社会、希腊正教社会、伊斯兰教社会、印度教社会、远东社会外，其余均已死亡。另有五种停滞文化：

- (1) 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（Polynesians）文化
- (2) 北冰洋的爱斯基摩文化
- (3) 游牧民族文化
- (4) 奥斯曼（Osmanlis）文化
- (5) 斯巴达文化

汤氏指出其中波利尼西亚及游牧民族两种文化，亦正在作最后的生死挣扎，距灭亡之期已不远。因此汤氏认为今日世界尚存的文化，连三种停滞文化在内，仅有八种。这八种中的西方文化，极有消灭或同化其他七种文化的可能。依汤氏所说，每一种文化也只有一个生命周期和只有一次创造力的发展。由此，不是由于文化创造能力强迫群众以服从代替仿效，便是由于旧的制度阻碍了新的力量的发展，或则因为遭受了天遣（The

nemesis of Creativity), 造物的忌盛忌全, 如《新约》所说, “升高者即是下降者”, 遂逐渐居于破产地步, 而陷于长期的僵化以致灭亡。汤氏所见与达尼列夫斯基略同, 因而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汤氏以中国文化因元、清两朝“一统国家”的统治而解体, 不知元之后尚有明的文化复兴, 又怎能武断清之后, 中国文化不能复兴?

总之, 达、斯、汤三氏固定周期之说, 只见到历史的近处, 未能见到历史的远处, 此三氏的史观, 迂谬而不能通达, 今日西方学者, 也大多不表同意。

当代人种学家克罗伯 (Affred L. Kroeber) 在 1944 年所出版的《文化生长的形势》(*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*) 一书中, 就反对上述的固定周期说。克氏指出一个文化并不一定在发达过一次之后, 就必须衰老而没有再生的机会。埃及文化的鼎盛和中衰, 前后至少有四次。中国有两次大的文化创造。其他国文化的创造期, 日本有四次, 印度有两次, 希腊、罗马、拜占庭有许多次, 法国有三次, 英国有三次, 德国有四次。克氏又指出, 一切大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都是经过同一的各阶段。因此所谓固定周期之说, 在克氏看来, 不能成立的。

由俄人归化美籍的索罗金 (P. A. Sorokin) 在 1951 年出版的《危机时代的社会哲学》(*Social Philosophies of an age of Crisis*) 中, 亦反对固定周期说。他指出埃及的宗教有四个兴盛时期 (公元前 3500- 公元前 3000, 公元前 2500- 公元前 2300, 公元前 1580- 公元前 1490, 公元前 1370- 公元前 1352); 印度的经济有五个兴盛时期 (公元前 321- 公元前 186, 78- 98, 320-500, 606-647, 1350-1600); 法国的国家组织发达过五次 (1050- 1325, 1600-1715, 1800-1815, 1850-1870, 1890-1940), 哲学发达过四次 (1075-1160, 1300-1350, 1600-1700, 1750-1850), 音乐三次 (1100-1350, 1650-1750, 1850-1910), 文学四次 (1070-1300, 1520-1580, 1630-1700, 1780-1900)。索氏认为此类例子, 太多了。

刻、索两氏以外的许多西方学者, 近二三十年来在美术史上、经济史

上、哲学史上以及社会科学各方面精密研究的结果，均承认一切文化都有一种周期律和节奏律的存在。所谓周期律，是周而复始的循环，并非为一个固定不变的周期；所谓节奏律，是说各种文化的发展，都有抑扬顿挫的节奏和拍子。因而索罗金氏归纳各家研究结果作一结论，即是“历史进化是循环性的”，是“创造性的重演”（Creatively recurring）。在任何时期内，没有一切不是新的，同时也没有一切不是旧的。“一切都是旧乐调的变样演出，在花样上、方向上、节奏上、拍子上、循环上，每次皆有不同的变化。”这便是演进的循环、循环的演进。自柏拉图以来，西方学者的史观在两千余年中经过多少变化与分歧，今日才又回到历史循环说的一条原路。

今日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，尚有救世论、“生命的肯定”（Life affirmation）论、复活论等，大都与直线型进化论采取相反的态度，而与循环论相通或相近。

中国学者史观的演变

古代中国哲人由于默察宇宙自然的演变与循环，很早即产生历史循环说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，庖牺氏（伏羲氏）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”（《周易·系辞传》）。可说庖牺氏对宇宙演变循环的奥秘，已多领悟。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，周文王与周公旦两人，均曾演《易》，由八卦相重而六十四卦。虽多用于占筮，而伦理与哲理亦深寓于其中。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，孔子（或为其门人）作《易传》时，对易理阐发尤详。《系辞下传》言圣人制器尚象之事云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通生于感，“感”则下经第一卦的咸卦（䷞），咸即是感。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”，即是生长之象。“久”即下经第二卦之恒卦（䷟）：“恒，久也，恒常久也，久于其道也。天地之道恒，久而不已也。”即是发

展之象。“穷”即下经第三十三卦的既济卦(☵☲)：“终止则乱，其道穷也，故初吉终乱。”即停滞衰落之象。“变”即下经第三十四卦的未济卦(☲☵)，为革(☶)、鼎(☱)二卦之和合。革，变革也。天地革而四时成，汤武革命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，即是毁灭与新生之象。通、久、穷、变，周而复始，循环不已，宇宙自然是如此，人类社会的演进亦复如此。

孔子未曾言明历史的循环性。《论语·八佾》中他赞美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”《为政》中又说：“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其后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认为历史在继续不断地演进中，未必就信周文之后，复用夏、殷的朴质的。则《易传》之作，在他“五十以学易”（《述而》）及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（《为政》）之后，他的史观始有所转变。以孔子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来推断，孔子殆为演进的循环论者，是无疑的。

继孔子之后的孟子，却发明治乱循环的史观。他在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答公都子问时说：“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”列举过去的史迹，来说明治乱的循环。《公孙丑》章并进一步以五百年为一个治乱周期：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。”《尽心》章复举史实来证明：“由尧舜至于汤，五百有余岁；若禹、皋陶，则见而知之。若汤，则闻而知之。由汤至于文王，五百有余岁；若伊尹、莱朱，则见而知之；若文王，则闻而知之。由文王至于孔子，五百有余岁，若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则见而知之；若孔子，则闻而知之。”孟子这种循环史观，极其正确；周期之说，亦具深理。唯以五百有余年为一固定周期，验于三代而不验于后世。

战国末年，齐人邹衍创阴阳五行说。五行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邹子认为它们是相胜（克）的，即金胜木、火胜金、水胜火、土胜水、木胜土。虞以土德王天下，夏以木德代之；殷以金德代夏，周复以火德代殷，因成五德终始论。邹子认为五德转移，与制度相应，历史即在这五行次第生胜、五德轮流转移中循环不已的。秦汉的杂家、道家和儒家，大抵均受此学说的影响。

吕不韦门下宾客所著的《吕氏春秋》属于杂家，其中以黄帝、禹、汤、文公当土、木、金、火四德，而以大螾大蝼、草木秋冬不杀、金刃生于水、赤乌衔丹书四者各为其应验，并谓“代火者必将水，天且先见水气胜。水气胜，故其色尚黑，其事则水”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及《封禅书》，均谓秦人自以得水德而王，且以文公获黑龙为其征应，想系受吕氏之说的影响。道家淮南王刘安杂采阴阳五行之说以与老庄的自然主义相调和，与吕氏均具循环的史观。

五行相胜说，汉人亦有异议。谓五行次第相生而非相胜。即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、水生火。太皞（伏羲氏）以木德王天下，炎帝以火德受之；黄帝土德，少皞金德，颛顼水德，均次第相受相生。五行相生，也形成了循环的史观。

汉代大儒董仲舒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，而倡天人相应说，兼采五行相生、相胜二义。董子认为人君受命于天，应取法于天，承天意以从事。天地之气合而为一，分而为阴阳，刊而为四时，列而为五行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义，皆取诸阴阳；凡阴必与阳合，阳尊而阴卑。“天地人主一也”，故人主南面，以阳为位，且为极尊。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的官制，取法于天的三月而为一时（季），四选而止，取法于天的四时而终。政制既象天时，则政事的庆、赏、刑、罚亦必与之相应。天之道，春暖以生，故政事上副之以“庆”；夏暑以养，故副之以“赏”；秋清以杀，故副之以“刑”；冬寒以藏，故副之以“罚”。天上有五帝：东方为春令木德的青帝，南方为夏令火德的赤帝，中央为土德的黄帝，西方为秋分金德的白帝，北方为冬令水德的黑帝。因而地上亦有五官以应之：东方为司农所主，务农本，足衣食，尚仁；南方为司马所主，辅君以定天下，尚智；中央为司营所主，明见成败，进善去恶，尚信；西方为司徒所主，兵不苟克，取不当得，尚义；北方为司寇所主，上下有序，邑无讼狱，尚礼。地上五官克尽厥职，则五行次第相生；若五行失职，则五行失序，相生者即转为相胜，天道固是如此的。

董子及其时的一般儒者，均认为地上的人君，皆符应于天上的某帝某德而生。地上人君受命，天上必降符瑞，如以火德王者黄龙见之类。人君既受命于天，必易服色，改正朔，更制度。如以水德王者色尚黑，以十月为岁首之类。人君受命于天，成功则必祭天—封禅—报告。天运循环，成功者去，如春夏秋冬的更迭互乘。及王朝德衰，天上必降灾异，人君知天命更改，应早物色贤人让国或更改改制以谋补救之道，否则革命起，终无以保其位。于是新人君复拜受天命。这种天人相应说，即肯定于人类历史永在这五行中循环的，所谓“天命无常，惟德是处”。这德是仁、智、信、义、礼，亦即五帝之德。

西汉《齐诗》有“五际”之说，谓当阴阳终始际会之岁，必有改革之政。五际者：亥为革命，一际也；卯为阴阳交际，二际也；午为阳谢阴兴，三际也；酉为阴盛阳微，四际也；戌为阴极阳生，五际也。若子、丑、寅、辰、巳、未、申等，不在阴阳际会之交，故不为际。西汉习《齐诗》者以翼奉为著，事之帝，属上书言灾异占候，谓“天道终而复始，穷则反本”；汉室诚能应运改政，即不异再受天命。也是以循环为历史的定律。

《礼记·礼运篇》有“三世”之说，即一为幽国、疵国、乱国之世；二为小康之世；三为大同之世。东汉何休释公羊“三世”为：据乱世、升平世、太平世。两者是否暗寓三世循环，未能确断。

王充著《论衡》以斥虚妄。他认为天生万物，悉出自然。天地合气，人偶自生；犹夫妇合气，子女的自生，非天有意于生人，因而君师亦非天所立。所谓天人相应，灾异谴告、五行生胜诸说，他均目为虚妄而予以驳斥。他以“世之治乱，在时不在政；国之安危，在数不在教”。“时”和“数”，在冥冥之中形成一种命运，所谓“天期自然”，非人力所能扭转与改变。这种自然主义的宿命论，虽为儒家思想的反动，却仍未否认历史在治乱盛衰中的循环性。

道教兴起后，其基本观念的道为宇宙的一种主宰，有时称“造化”，有时称“太乙”。而道家认为“道”是流动的、运行的、循环的，如李白

诗中所谓“天地为橐籥，周流行太易”、“大力运天地，羲和无停鞭”。道家的宇宙观既是如此，他们的历史观自然也是如此。

古代印度哲人，有生、住、异、灭的四相流转之说。生相，即是创造相；住相，即是发展相、保持相；异相，即是破坏相、衰落相；灭相，即是消灭相、再造相。生、住、异、灭四相的流转不已，与《周易》的通、久、穷、变的周而复始之义若合符节。佛教传入中国后，此种观念也深为中国佛教徒所接纳。小乘佛教的生死轮回说，亦自四相流转的精义中嬗蜕出生。

唐代为儒、佛、道三教并行的时代，故唐代学者的历史观，大抵不出循环论的范畴。宋代为儒、佛、道三教合流的时代，宋代理学者的史观则大都摄佛、道两教的学说予以融会。

《周易》的演作，为阴阳的二元论。汉人扬雄拟《易》作《太玄》，受五行说影响，参以历法而成始、中、终的三元论。宋人司马光拟《太玄》而作《潜虚》，殊无创见。至周敦颐作《太极图》，则系采撷道家修炼之术的《无极图》及《先天地之偈》，而使与易理会合。邵雍作《皇极经世》，不仅受道家《先天图》的影响，且采唐僧一行“大衍历”的推算法，而成为一种综合性的学说。

邵子以“太极”、“动静”、“阴阳刚柔”来解释宇宙万物生长盈虚之理，《易》以阴阳为两仪，此则以动静为两仪；《易》以春、夏、秋、冬为四象，此则以阴、阳、刚、柔为四象。乃系受道家学说的影响而成为四元论，与《易》略异者。邵子复以六十四卦来表示宇宙万物蜕演变化的程序，较先哲解《易》者尤为精密。《易》的初生为复卦(䷗)，一阳始生，即宇宙万物始生之象。自是阳长阴微，至乾卦(䷀)而达极度，为宇宙万物壮盛之象。阳极而一阴之姤(䷫)生，为宇宙万物始衰之象。自是阴长阳消，至坤(䷁)而达极度，为宇宙万物毁灭之象。阴极而一阳之复(䷗)又生，如是周而复如、运行无穷，有如下表：

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|----|------|----|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|---|---|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卦 | 复 | 临 | 泰 | 大壮 | 夬 | 乾 | 姤 | 遁 | 否 | 观 | 剥 | 坤 | 复 | 临… |
| 卦象 | ䷗ | ䷒ | ䷊ | ䷡ | ䷪ | ䷀ | ䷫ | ䷗ | ䷋ | ䷓ | ䷖ | ䷁ | ䷗ | ䷒… |
| 天地及人事 | 天开万物始生 | 地开 | 开物人生 | | | 万物 壮盛 | 万物 始衰 | | | | 闭物 | 天地闭 万物毁灭 | 天开万物又生 | 地开… |

宇宙万物生灭循环之理，至此极为显明。邵子推算天地历程，系采“大衍历”推算之法，未见精确。他以天的四时为元、会、运、世，地的四维为岁、月、日、辰。辰为时间单位，十二辰为一日、三十日为一月、十二月为一岁，即一岁为十二月、三百六十日、四千三百二十辰。以此数推之，可知天的四时及地的三十岁为一世。再推演之，即十二世为一运，三十运为一会，十二会为一元。也即是一元为十二会、三百六十运、四千三百二十世，计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。天地历程，以一元为始终；终而复始，运行无穷。以一元的时间与六十四卦配合，天地亦始于复而终于坤。这种固定的周期循环论，未免把时间拉得太长了，与天地演变及人事变化上均不相符。因而邵子依据象数论列古今的治乱兴衰，亦极牵强附会。他以皇、帝、王、伯四种政体，分掌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；正、受、改、摄四命，尚自然、尚让、尚政、尚争四事。仁、礼、义、智四德，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业，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四经，有如下表：

| | | | | | | | | |
|----|---|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|---|----------|
| 三皇 | 春 | 作用生 气候温 | 正命 | 因而因 天与 | 以道化民——尚自然 | 仁 | 士 | 《易》 |
| 五帝 | 夏 | 长 燠 | 受命 | 因而革 人归 | 以德教民——尚让 | 礼 | 农 | 《书》 |
| 三王 | 秋 | 收 凄 | 改命 | 革而因 征诛 | 以功劝民——尚政 | 义 | 工 | 《诗》 |
| 五伯 | 冬 | 藏 冽 | 摄命 | 革而革 臣行君事 | 以力率民——尚争 | 智 | 商 | 《春 秋》 |